

《集王圣教序》在日本大正时期的鉴藏与出版

——以罗振玉题跋的两个宋拓本为中心——

张 亚 敬 黄 政 霖¹⁾

The Publication and Propagation of the Ji Wang shengjiao xu
in Japan during the Taisho Period:
Centered on Two Song Rubbings with Luo Zhenyu's Inscriptive Writings

ZHANG Yajing HUANG Zhengli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ublication and propagation of Wang Xizhi's calligraphy in modern Japan, using the two Ji Wang shengjiao xu published in Japan during the Taisho period as the object of study. Luo Zhenyu brought his collection of Ji Wang shengjiao xu to Japan, and together with Naito Konan, influenced the publication of Ji Wang shengjiao xu by Hakubundo, setting off a craze for Ji Wang shengjiao xu which was reprinted three times in one year. Besides, these publications of the Ji Wang shengjiao xu contain inscriptive writings, which reflect their methods of identification and concepts of connoisseurship. In the light of today's research findings and their reappraisal, it is clear that the Ji Wang shengjiao xu in Luo's collection is not the finest rubbing. However, it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action and connoisseurship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alligraphy in modern times. In the dozen years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Luo's collection, various Northern Song rubbings came into Japan and continued to enhance and refresh the vision of Luo and Japa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onnoisseurship circles. Along with the boom in collotype printing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rubbings, although other Northern Song rubbings of the Ji Wang shengjiao xu were published, there is no other instance of several editions being printed in a year as with Luo's collection. The revered classical rubbings became less valuable

1) 作者介绍：张亚敬，日本关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科博士研究生在读、东西学术研究所副研究员；黄政霖，中国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本文题跋原文由黄政霖识读。

with the trend toward colotype printing over the decades, thus showing the change in calligraphic classics influenced by the popularization of techniques of modern printing of the engraved model-letters(fatie) and rubbings.

キーワード：罗振玉 (Luo Zhenyu)、内藤湖南 (Naito Konan)、题跋 (inscriptive writing)、《集王圣教序》(Ji Wang shengjiao xu)

本文以日本大正前期影印出版的二种《集王圣教序》(传为北宋拓本)为研究对象,考察王羲之书迹在近代日本的出版、鉴藏与传播。一方面,罗振玉将篋藏的《集王圣教序》带到日本,与内藤湖南主导了博文堂关于《集王圣教序》的影印出版,掀起了《圣教序》“一年间连印三版”的热潮。另一方面,影印出版物中,均有二人题跋,反映了他们关于《集王圣教序》的鉴定思路和品评观点。结合今天的研究成果,重新审视二人的鉴定观点,罗氏所藏《集王圣教序》显然难以称得上是“北宋佳拓”的一流拓本。

但是,这一拓本却在近代中日书法交流、书法鉴藏、书法传播过程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罗氏藏本影印出版后的十数年间,各种不同的北宋拓本先后流入日本,并不断提高和刷新着罗振玉以及日本书画鉴藏圈的眼光和认知。伴随着书画碑帖影印的热潮,虽然其他北宋拓本均有刊行,但再难有罗氏藏本般连印数版的待遇。备受推崇的某一经典法帖,在数十年间的碑帖影印潮流中黯然失色,由此亦可窥见现代印刷术普及和法书出版的影响下,书法“经典”的更迭。

1 罗跋《集王圣教序》二种

《集王圣教序》全称《怀仁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咸亨三年(672)十二月八日立碑,由李世民撰文,怀仁集王羲之行书书迹所成,碑文三十行,行八十数字不等,刊刻历时二十五年。碑原在陕西西安弘福寺,北宋初移入文庙,现存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其书作也屡见于后世诸多法帖之中,成为帖学书风的典范。此碑集字由怀仁从唐代所藏王羲之真迹中直接摹出,被认作“纤微克肖”还原了书圣王羲之的真迹,因其首开集字碑刻之先河,又引领了后来宋代王羲之刻帖的兴盛,故在书法史、碑刻史上意义非凡。

作为传世名碑,《怀仁集王圣教序》历来被书家、学人所重,在后世屡经传拓和摹刻,自清以上,拓本、翻刻本层出不穷,数量不计其数。罗振玉曾在博文堂影印的《北宋拓集王圣教序》黑川本后题跋云:

“右軍書法,盛于初唐,顧屢經劫火,真蹟化為雲烟,今日欲睹山陰真面,但有於石刻求之,宋世閣帖,經侍書王著手模,全失筆意,所謂鄉願亂德,久為識者所識,即右軍真相,僅可於唐



图 1:《大唐三藏圣教序》封面及题签



图 2:《北宋拓集王圣教序》封面及题签

刻中求之，於是歷代學者，爭求懷仁集序，而複本至多，天水旧拓，希於星鳳。”²⁾

由此可见，在王羲之“真迹化为云烟”之后，历代学者争求《圣教序》以及“复本至多”的现象，相较于宋代“全失笔意”的诸多刻帖，罗氏认为王羲之法书的“真面”，仅可于“天水旧拓”的“唐刻中求之”。现今流传的《集王圣教序》原刻原拓仅见于文献记载³⁾，已无初拓本、唐拓本传世，现传拓本中以北宋拓为最古。明清以来，学者鉴藏家也是以宋拓为“善本”。

2 罗、内藤关于《集王圣教序》的出版和鉴定

罗氏寓居京都期间，曾就两个不同版本的宋拓《集王圣教序》作题跋，一为自己所藏剪裱本，内藤湖南段之携渡日本，属博文堂于1911年4月珂罗版影印出版。一为1912年黑川幸七购入的吴荣光旧藏剪裱本，在大正二年（1913）二月由博文堂印刷发行。两本影印刊物基本信息见（表1），1911年，罗氏就自藏《大唐三藏圣教序》题跋道：

“集右軍書聖教序宋拓本，平日所見不下十餘本，然多南渡後拓本，此本曩得之西吳周氏，精采殊勝，初亦不敢遽信為宋未渡南時物，比來京師見楊大瓢跋關中南氏所藏宋末周草窗本，草窗言得之京口一士人家，汴京未失時所拓者，並幾與此細校，一一吻合，始知此本確為北宋隴墨。歲

2) 罗振玉《北宋拓集王圣教序跋》，《北宋拓集王圣教序》（黑川本），油谷博文堂，大正二年二月廿七日发行。

3) 王澐（2000: 792）。“雍正六年，新建友人裘鲁青之任归安，过余九龙山斋，款语移日，道及《圣教序》云，普见山东新城王氏所藏唐拓朱砂木，朱色鲜润，香气袭人，自首迄尾，纤毫无阙。”

表 1：罗振玉、内藤湖南题跋宋拓《集王圣教序》二种（油谷博文堂出版）

出版物	出版时间	题签及款识	鉴藏印（拓本第一开）	题跋	原件题签及款识	原件题跋	原件现藏地
《大唐三藏圣教序》	明治四十四年（1911）四月四日出版发行 六月一日第二版发行 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版发行	截取拓本中“大唐三藏圣教序”部分； “神品”（朱文）；	“叔言大利”（白文）； “周紫垣家珍藏”（白文）； “神品”（朱文）； “光照审定”（朱文）； “钱其恒印”（白文）； “乐圃”（白文）； “芸斋宝玩”（朱文）； “曾经周紫垣处”（朱文）；等	内藤湖南； 罗振玉； 日下部鸣鹤；	“圣教序宋拓原本”； 款署“生沐六兄属 秋水题”； 张鑑（白文）；	汪士骥； 内藤湖南； 罗振玉； 日下部鸣鹤；	京都国立博物馆
《北宋拓集王圣教序》	大正二年（1913）二月廿七日发行	“北宋拓集王圣教序”； 款署“内藤虎书”； “虎”（朱文）、“湖南”（白文）；	“吴伯荣氏秘笈之印”（朱文）； “吴氏荷屋平生真赏”（白文）； “赵氏子昂”（朱文）； “臣天池印”（白文）； “弘农郡图书印”（朱文）； “晋府书画之印”（朱文）； “伍元蕙审定金石文字”（朱文）； “南海吴荣光珍藏书画”（朱文）； “伯荣秘宝”（白文）；等	姜宸英； 蔡之定； 何绍业； 吴荣光； 翁方纲； 叶志诜； 罗天池； 罗振玉； 内藤湖南；	帙题签：“北宋拓圣教序”（篆书）； 款署“飞香馆藏 罗振玉篆”； 罗振玉（白文）； 外题签：“宋拓圣教序”； 款署“宋征舆、姜宸英跋，玉壶秋碧本，南海吴氏藏第一本”； “圣教序”（隶书） 款署：“此黎瑤石先生隶书，庚辰七月望”； “覃溪”（朱文）； “荷屋所藏，予为临此签，信墨缘也”； “苏斋墨宝”（朱文）；	同影印本	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庚戌，吾友内藤博士来京师，出此相示，一見驚嘆，視予之篋藏十餘歲，必竣校以周草窗本而始確信為北宋拓，其鑒賞之敏鈍，相去殆不可道里計矣。博士既返之歸國、付良工精印，並介予此本於其友上野君，其愛之篤，與博士同，因以歸之。爰識語於冊尾、以存鴻爪。

辛亥七月下澣上虞羅振玉。鈐印：臣玉之印（白文） 叔言（朱文）⁴⁾

从跋中可知，罗振玉此拓本的由来，是得之于“西周吴氏”（周昌富⁵⁾），在与杨宾题跋的“周草窗⁶⁾本”对比细校后，判定此本为“北宋拓本”。1910年，内藤湖南奉差赴北京，获睹罗氏收藏，并段之此拓本携归日本，属博文堂珂罗版影印出版。后来，以内藤为中介，罗振玉将此册转让给了时任大阪朝日新闻社的社长上野理一。从题跋时间来看，辛亥年七月下旬即1911年9月

4) 罗振玉《北宋拓集王圣教序跋》，《北宋拓集王圣教序》（上野本），油谷博文堂，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发行。

5) 周昌富（1839-1895），字鹤峰，号芸斋，国子监生，湖州南浔人，为周庆云叔父。能诗善书，工行楷。为道光、咸丰年间“南浔八牛之一”。1865年与兄长周昌炽合资在上海集贤里开设周申昌丝行，在经商之余，常与当时的文人名士交游，喜收藏书画及古籍善本，是南浔著名收藏家。

6) 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蘋洲、泗水潜夫、弁阳老人等，祖籍山东济南，吴兴（浙江湖州）人。宋末元初文学家、词人。书画鉴赏家。“他诗词并能，而以词闻名，著有《草窗韵语》《草窗词》等。在诗词、笔记的成就之外，他也擅长于书画鉴赏，著有《志雅堂杂钞》、《云烟过眼录》，是宋末元初书画鉴藏较为重要的著录书籍。周密结交者，包括赵孟頫、鲜于枢、郭天锡、王芝、乔彞成等等，皆是当时第一流的书画家和鉴藏家。

中下旬，彼时，博文堂已影印发行两版《大唐三藏圣教序》，罗氏此跋正是作于第三版发行之前。罗氏题跋前面是内藤湖南同年“四月仲七日”所作长篇题跋：

“東觀餘論云：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謁弘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劇蹟，咸萃其中。然唐世學者猶眇，其時士林以搨摹為珍，未重石本。迄于北宋，歐趙諸公著錄金石，出土既多，穢蠟日盛，聖教始見重於世，而學弗能至，輒有院體之目。宋室南渡，京兆淪入於完顏，關中諸碑皆不易拓，於是偽複帖橫行，而聖教又燿焉。至明中葉，士大夫稍復知重此碑，則石已斷矣。聖教未斷本之可貴，而北宋拓本之尤可寶，為此故也。歲庚戌，奉差赴清國北京，獲睹羅叔言學部所藏北宋拓聖教序，墨氣醜藹，古香盎然，龍躍虎卧，洞心駭目。黃長睿謂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諦審叔言藏本，與我內府喪亂帖、岡田氏九月十七日帖神理全同，知長睿之言猶信。二帖並唐初摹本，為寓內之奇寶。宋拓中，有像有字，陵遲遲字，前聞前字，來書來字，深極空有極字，言未馳未馳二字，詎能能字，中夏中字，才謝謝字，翹心、心田心字，慧日日字，受想想字，鄙拙拙旁出字，湛寂湛旁甚字，以二帖校對，若已見其兒孫，又覲其父祖矣。因乞叔言付印，以廣其傳。叔言慨然見借，乃攜歸渡海，屬博文堂主鑄入於玻璃版，數月而成。骨肉勻秀，精采煥然，鋒穎轉折，纖毫畢具，此則近日技術之神工，非異時摹勒可比。自今而後學此碑者，得夫人而收蓄宋本，不亦韙歟？”

此本屢更改裱，間為工人剪損，若內出失去出字，其尤甚者。然以翁覃谿所攷相證，其為宋本，歷歷可徵，晉右，右字口內未泐，形潛，潛字日末小橫出小直外，佛道崇虛，道字上二點有斷痕，崇字山下有右小橫，四教字尚完好，杖策孤征，孤字子旁有缺痕，奧字未泐，兩羣字下直俱為破筆，紛紜二字髣髴可辨，卉木，木字收筆未泐，聖慈，慈字未泐，久植勝緣何以顯揚，何以二字泐痕未連上緣字糸旁，深以為愧，深字左上有複啄筆。凡此諸證，有目共睹，曷用更事聚訟耶？明治辛亥四月仲七日，內藤虎。鈐印：藤虎之印（白文）字曰炳卿（朱文）”⁷⁾

跋文首先援引《东观余论》介绍了《集字圣教序》碑从唐代“未重石本”到宋代学习圣教序的“院体”面貌，再到“明代中叶，石已断矣”的经过，说明了“未断本”北宋拓本尤为可贵的缘由。“墨气醜藹，古香盎然”记录了内藤对这一拓本的观感和印象，“龙跃虎卧，洞心骇目”可见当时内藤获观前贤书迹古拓本的震撼和激动。在与日本所藏的《丧乱帖》、《九月十七日帖》作字形对比之后，内藤得出“神理全同”的结论。继而假借渡海，交由博文堂玻璃板影印，以广其传。最后，内藤以翁方纲考据观点为依据，对此本的考据字作梳理，判定此本为“宋本”。1913

7) 内藤湖南《北宋拓集王圣教序跋》，《北宋拓集王圣教序》（上野本），油谷博文堂，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发行。

年，《北宋拓集王圣教序》（黑川本）影印发行，后有罗振玉于1912年的题跋：

“右軍書法，盛于初唐，顧屢經劫火，真蹟化為雲烟，今日欲睹山陰真面，但有於石刻求之，宋世閣帖，經侍書王著手模，全失筆意，所謂鄉願亂德，久為識者所譏，即右軍真相，僅可於唐刻中求之，於是歷代學者，爭求懷仁集序，而複本至多，天水旧拓，希於星鳳，吾鄉楊大瓢鐵函齋書跋已有未斷真本，世不多見，見亦價等連城語，矧又在二百餘年之後乎，東邦同好每託予物色宋拓善本，苦無以偏應，去歲赤縣崩淪，士夫生計蕩然，乃爭出寶物乞售，一月中，予得見宋拓聖教序凡三本、曰吳荷屋藏本，曰詒晉齋本，曰桐城方氏本，三本皆有名海內夙交求見而不可得者，並几互勘，以吳本為最善，為明晉府遺寶，無尋常描墨之失，神彩煥發，為北宋精拓，確無可疑。

飛香館主人於三本中獨取此本可謂具眼矣，至冊後鑒藏家諸跋，宋蔡何吳並為定論，覃溪所云吾家天池詆為謬妄，亦非過當，惟增記又盛稱周本，殆未知周本之尤劣者，予曩至都下，聞都人士嘖嘖稱周本，推為海內第一，後於張筱帆中丞許見之，始恍然於傳聞之妄，天池乃引彼本此抗衡，其愚闇，殆與翁等，於此益知鑒賞之難也。壬子四月，上虞羅振玉審定題記。鈐印：羅振玉（白文）”⁸⁾

跋文中交代了辛亥革命之后，士大夫为生计所困，争相出售家中藏品的情况，在此背景下，罗氏一月之中，得见宋拓《集王圣教序》三个版本，分别为吴荣光藏本、永理藏本和方贞观藏本，其中以吴荣光藏本为最佳，并肯定了黑川幸七鉴藏的眼光。罗氏肯定帖后诸人题跋中“北宋拓本”判定观点的同时，对于罗天池批判翁方纲“宋末元初拓本”判定的谬论给予肯定，就罗天池以及诸多称颂“周培祖藏本”的观点，提出质疑，进而慨叹“益知鉴赏之难也”。此外，题跋中值得注意还有两点：其一，“山阴真相”、“右军真相”的字眼，这是罗振玉题跋中被反复提及和强调的。其二，志同道合的日本友人多次委托其物色宋拓善本，可以窥见罗氏在日本书画鉴藏圈的活跃和周旋，以及日本书画鉴藏圈对罗氏鉴藏水平的认可。其后，是内藤湖南在出版同年所作的题跋：

“清南海吳荷屋中丞，富收藏，精鑑賞，其舊藏宋拓集王聖教序，近歸浪華飛香館。有明晉府印記，姜西溟以下數名人題跋。吳君屢以他本對校，凡南宋本缺損之字此本完好者，皆自注于帖上，定為北宋佳拓，辯翁正三以為宋末元初拓之謬，鑿鑿有據，非以其所自藏，故為抑揚也。余

8) 罗振玉《北宋拓集王圣教序跋》，《北宋拓集王圣教序》（黑川本），油谷博文堂，大正二年二月廿七日发行。

所目睹上野有竹君藏本，毡蜡较精，而多剪损移补之字，与此本互有短长，要其为北宋善拓则一也。馆主人顷将景印，以贻同好，属予跋尾。嗚呼，三年之間，兩跋北宋本聖教，如許眼福，豈世所數觀，欣然援筆書之。大正二年二月，湖南內藤虎。鈐印：藤虎之印（白文）”⁹⁾

相对于两年前洋洋洒洒的五页题跋，内藤此次只做了简单的记述。跋文中同样认定此本为北宋拓本，纠正了翁方纲“宋末元初本”的判定谬误。内藤将上野本与此本作对比，相较之下上野本“毡蜡较精，而多剪损移补之字”，认为二本“互有短长”，但都是北宋拓本。

关于《集王圣教序》宋拓版本的整理和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早期的研究者在满目琳琅的宋拓本中，往往无法确切的判定某一本书究竟是“北宋拓本”还是“南宋拓本”，故而含糊的统称为“宋拓”。自1973年8月，西安碑林整修工作中发现一整纸未断本《集王圣教序》¹⁰⁾开始，加上现代影印技术的发展和成熟，研究者们对《集王圣教序》“北宋拓本”和“南宋拓本”的区别，以及影印本整理的研究逐渐展开¹¹⁾。碑石裂纹的程度以及拓本中“久植胜缘”之“缘”字的残损情况，也成为区分北宋本和南宋本的大致依据。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再回看罗振玉题跋的两个拓本，这两个拓本均被罗振玉和内藤判定为“北宋拓本”，那么这两个拓本的质量究竟如何，是否称得上“北宋善本”？他们当时的判定是基于什么样的依据，如今看来二人的结论是否妥当？这两个拓本在日本的受容情况如何，在现代影印技术渐趋成熟的过程中，两个拓本的影印传播带来了哪些影响，这两个拓本在中日书画交流中又是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以下以罗振玉旧藏本为基础，从内藤湖南题跋中的考据字出发，结合前人关于《集王圣教序》北宋拓本的考据观点¹²⁾，以公认的传世北宋拓《集王圣教序》善本¹³⁾为参

9) 内藤湖南《北宋拓集王圣教序跋》，《北宋拓集王圣教序》（黑川本），油谷博文堂，大正二年二月廿七日发行。

10) 王壮弘（2008: 81）。“一九七三年八月陕西省文管会在整理倾斜《石台孝经》时，于石叠缝处发现一整纸未断本《集王圣教序》。同时发现女真文书，知为南宋间石沱金国时拓本。这一发现并《石台孝经》移动时间，为凡未断本皆是宋拓提供了依据。”

11) 张彦生（1963: 34-38）整理所见《集王圣教序》宋拓本16种，就北宋拓本与南宋拓本的“字画肥瘦”、“笔画与石花泐连”等区别作分析，并罗列对比了北宋拓本、南宋拓本、明拓本、清初拓本的碑裂情况；王壮弘（2008: 78-93）整理《集王圣教序》北宋拓本影印本14种，并对《圣教序》北宋本、南宋本的区别作论述；冯小夏（2013）在两位先生的基础上，结合当下已查知的北宋拓本及相关影印出版物作梳理和总结，在对25种《集王圣教序》北宋拓本的同时，对其中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三种做详细介绍，并叙述了民国以来该碑刻北宋拓本的影印出版情况。

12) 此处以清代方若著，王壮弘增补的《增补校碑随笔》一书中，关于《集王圣教序》考据字论述观点为参考依据。王壮弘（1931-2008）是中国近现代文物专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碑帖学家、书画家、书画鉴定家。其早年于国家文物单位担任征集文物工作，由于他见多识广，鉴别力强、记录详细、交友广阔，一时名流如徐森玉、吴湖帆、沈尹默、容庚、谢稚柳、钱镜塘、唐云、傅雷、徐行可、周煦良、潘景郑、顾廷龙、刘海粟等皆与之友善。此外还有各地碑帖同行如胡介梅、马宝山、张彦生等，亦是皆

照，对这两个拓本作讨论。

3 《集王圣教序》的出版及版本优劣

内藤湖南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上野本）题跋中，以翁方纲所考相证，其所述考据点如下：

- 1.（第十六开左侧三行）“内出”失去“出”字；
- 2.（第一开右侧第四行）“晋右”，“右”字“口”内未泐；
- 3.（第二开右侧第三行）“形潛”，“潛”字“日”末小横出小直外；
- 4.（第二开右侧第四行）“佛道崇虚”“道”字上二點有断痕，“崇”字“山”下有小横；
- 5.（第四开右侧第四行）（第十一开右侧第三行）两“羣”字下直俱为破笔；两“羣”字下直俱为破笔；
- 6.（第四开左侧第一行）“紛亂”二字仿佛可辨；
- 7.（第六开右侧第一行）“杖策孤征”“孤”字“子”旁有缺痕；
- 8.（第八开左侧第三行）“卉木”“木”字收笔未泐
- 9.（第十五开右侧第三行）“久植勝緣，何以顯揚”，“何以”二字泐痕未连上“緣”字“糸”旁；
- 10.（第十六开，左侧第二行）“深以爲愧”，“深”字左上上复啄笔；

吴荣光在《北宋拓集王圣教序》（黑川本）中注记有二十四处，其所述考据字如下：

- 1.（第二开右侧二行）南宋本“愚”字中损；
- 2.（第二开右侧三行）南宋本“智”字下损；
- 3.（第二开左侧二行）南宋本“无生”，“无”字中损；
- 4.（第五开左侧二行）南宋本“乘”字中损愈甚；
- 5.（第六开右侧一行）南宋本“轻”左损；
- 6.（第六开左侧四行）南宋本“将”字右损愈甚；
- 7.（第七开左侧二行）南宋本“生”字中下损；

、有交情。一时间众多名家欲收藏碑帖者多请王壮弘先生代为掌眼。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增补校碑随笔》一书出版，更是名声大振，远播海外，日本名家如今井凌雪等皆专程撰文推荐此书，此书在日本、台湾等地均有翻印本。王壮弘也被称为近百年来碑帖鉴定之集大成者。其生平主要著作有《增补校碑随笔》、《碑帖鉴别常识》、《崇善楼笔记》、《帖学举要》、《六朝墓志检要》等。王壮弘增补的《增补校碑随笔》一书中，整理了《集王圣教序》北宋拓本的主要特征和判定意见，被学界所公认，较有代表性和权威性。

13) 此处选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本和上海图书馆藏本，此二本均为明代碑帖收藏大家张应召旧藏，是现在学界公认两种传世最佳北宋拓本。

8. (第八开左侧四行) 南宋本“拙”字右下损;
9. (第九开右侧四行) 南宋本“帝”字中损;
10. (第十开右侧一行) 南宋本“源”字右中损;
11. (第十开右侧二行) 南宋本“慈”字上损;
12. (第十开右侧五行) 南宋本“有”字中损;
13. (第十开左侧五行) 南宋本“慧”字上损;
14. (第十一开左侧二行) 南宋本“昆”字左下损;
15. (第十一开左侧五行) 南宋本“翠”字左下损;
16. (第十二开右侧一行) 南宋本“奥”字下、“感”字右损愈甚;
17. (第十二开右侧三行) 南宋本“慧”字上损;
18. (第十二开左侧四行) 南宋本“凝”字稍损;
19. (第十四开右侧二行) 南宋本石破处到“缘”字右;
20. (第十五开左侧四行) 南宋本“一”字损去收笔;
21. (第十六开左侧二行) 南宋本“无无明”上“无”字略损, 不见笔意;
22. (第十七开右侧四行) 南宋本“蜜多”, “多”字上两撇损;
23. (第十七开左侧五行) 南宋本“揭谛揭谛”第二“谛”字中横损;
24. (第十八开右侧一行) 南宋本“菩提”, “菩”字长画损;
25. (第十八开右侧三行) 南宋本“太”字上中损;
26. (第十九开右侧一行) 南宋本“二”字下画损;

王壮弘在其所著《增补校碑随笔》中对《集王圣教序》北宋拓本的考据如下:

1. 北宋拓, 四行“在智犹迷”之“迷”字“米”部与“辶”部间, 仅稍有泐痕;
2. 北宋本, “纷纒”“纷”字“分”部首虽不可见;
3. 六行“纷纒”之“纒”字仅“乚”部首与石泐连;
4. 北宋本, “以”字右笔首未泐粗;
5. 北宋拓, 八行“百重寒暑”之“重”字“田”部完好无泐;
6. 北宋拓, 十五行“慈”字完好, 南宋本十五行“慈”字仅损首二点;
7. 北宋拓, 十七行“鹿苑”之“鹿”字“𠂔”部完好;
8. 北宋本廿一行“缘”字左下不连石泐痕; 南宋本廿一行“缘”字左下已连石泐痕;
9. 北宋拓, 廿四行“波罗蜜多心经”之“蜜”字完好无损;
10. 北宋拓, 廿七行“般若波罗蜜多”之“多”字上“夕”部完好;

根据三人的观点, 笔者将罗振玉旧藏本(上野本)、吴荣光旧藏本(黑川本)中三人提及到的

考据字进行逐一比对，并结合现今传世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两本北宋善本进行参照，整理总结出考据字 40 例。（表 2）

首先从王壮弘先生的考据点出发作比照，如表中所示：

字例 5 “在智犹迷”之“迷”字，王壮弘提出以“米”部与“辶”间的泐痕情况为依据来判定是否为北宋拓本，黑川本、国博本、上图本均未有明显泐痕，而上野本“迷”字“米”部与“辶”部相连；

字例 14 “百重寒暑”之“重”字，王壮弘以“重”字“田”部的“完好无泐”为界定作为北宋拓本的依据，黑川本、国博本、上图本“田”部右侧均有泐痕，但“田”部中横右侧及竖笔尚清晰可辨，上野本田部泐痕明显，竖笔有明显填墨涂描；

字例 22 “圣慈”之“慈”字，王壮弘认为：“北宋拓，‘慈’字完好。南宋本‘慈’字仅损首二点。”黑川本、国博本、上图本“𠂔”部未损，撇画末笔有泐痕，而上野本“慈”字“𠂔”部已损，笔画漫漶；

字例 25 十七行“鹿苑”之“鹿”字，王壮弘以“𠂔”部不损为界定北宋本的依据，黑川本、国博本、上图本“𠂔”部均完好无损，上野本“𠂔”已损；

字例 31，“久植胜缘，何以显扬”之“缘”字，三人均有论述，王壮弘认为“北宋本‘缘’字左下不连石泐痕，南宋本‘缘’字左下已连石泐痕”，吴荣光提到“南宋本石破出到‘缘’字右”，内藤记述为：“泐痕未连上‘缘’字‘糸’旁”，对比来看，黑川本、国博本、上图本“缘”字与泐痕分离明显，且“糸”旁清晰可辨，上野本虽然泐痕未连“缘”字左下，但“糸”部漫漶。此外，“何以”之“以”黑川本、国博本、上图本“以”字右部首笔清晰可见，上野本已泐。

字例 33，“波罗蜜多心经”之“蜜”字，王壮弘以“蜜”字中部未损为界定北宋拓本的依据，黑川本、国博本、上图本“蜜”字中间“夕”部均完好无损，上野本“夕”部已泐；

字例 36，“般若波罗蜜多”之“多”字，王壮弘以“多”字上“夕”部完好为界定北宋本的依据，吴荣光同样以“多”字上两撇未损来判定是否为北宋拓本，黑川本、国博本、上图本“多”字上“夕”部均完好无损，上野本上“夕”部已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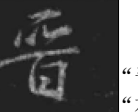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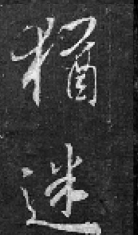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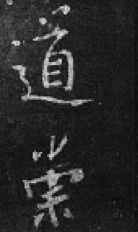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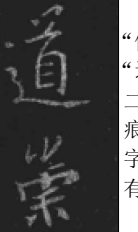
其次，以吴荣光在黑川本上的批注为参照，如表中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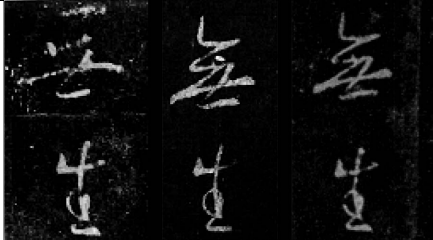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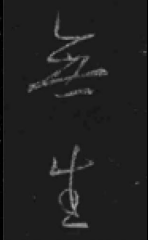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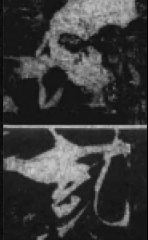


字例 3，“虽愚不惑”之“愚”字，吴氏认为南宋本“愚”字中损，黑川本、国博本、上图本“愚”字中部未损，上野本“愚”字中不漫漶有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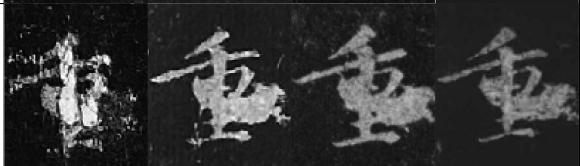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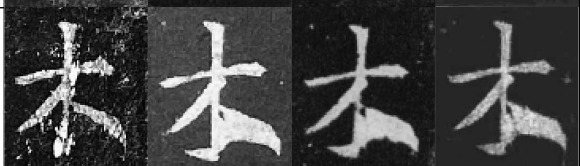

字例 7，“无灭无生”之“无”字，吴氏认为南宋本“无”字中损，黑川本、国博本、上图本“无”字中部未损，笔画清晰可辨，上野本“无”字中部漫漶，中间点画已泐；

字例 21，“不究其源”之“源”字，吴氏认为南宋本“源”字右中损，黑川本、国博本、上图本“源”字均右边“日”右下稍有泐痕，笔画清晰可辨。上野本“源”字漫漶，且整体笔画粗细

表 2：四版本《圣教序》考据字字例对比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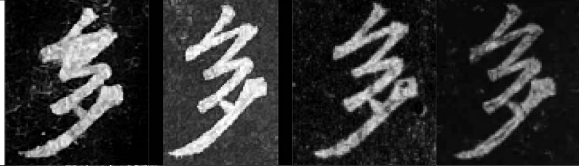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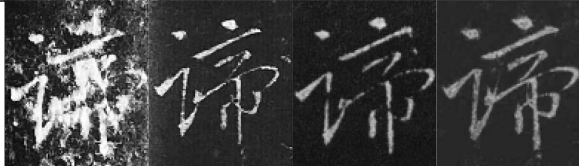

字例	上野本	黑川本	国博本	上图本	内藤题跋 考据字	(清)方若著, 王壮弘增补 《增补校碑随笔》 (修订本)考据字	吴荣光 (黑川本) 批注考据字
1					“晋右” “右”字 “口”内未 泐；		
2					“形潜” “潜”字 “日”末小 横出小直 外；		
3							南宋本 “愚”字中 损；
4							南宋本 “智”字下 损；
5						北宋拓“在智犹 迷”之“迷”字 “水”部与“之” 部间，仅稍有泐 痕；	
6					“佛道崇虚” “道”字上 二点有断 痕，“崇” 字“山”下 有小横；		



7					南宋本“无生”“无”字中损；
8			两“羣”字下直俱爲破筆；		
9			两“羣”字下直俱爲破筆；		
10			紛亂二字髣髴可辨；	北宋本，“紛亂”“紛”字“分”部首雖不可見；六行“紛亂”之“亂”字僅“乚”部首與石泐連；	
11				北宋本，“以”字右筆首未泐粗；	
12					南宋本“乘”字中损愈甚；

14		<p>“杖策孤征” “孤”字 “子”旁有 缺痕；</p>		
14			<p>北宋拓“百重寒暑”之“重”字 “田”部完好無 泐；</p>	
15				<p>南宋本 “轻”左 损；</p>
16				<p>南宋本 “将”字右 损愈甚；</p>
17				<p>南宋本 “生”字中 下损；</p>
18		<p>“卉木” “木”字收 笔未泐</p>		
19				<p>南宋本 “拙”字右 下损；</p>

20				南宋本 “帝”字中 损;
21				南宋本 “源”字右 中损;
22		北宋拓,“慈” 字完好,南宋本 十五行“慈”字 仅损首二点;		南宋本 “慈”字上 损;
23				南宋本 “有”字中 损;
24				南宋本 “慧”字上 损;
25		北宋拓,“鹿苑” 之“鹿”字 “山”部完好;		
26				南宋本 “昆”字左 下损;
27				南宋本 “翠”字左 下损;

28							南宋本 “奥”字下， “感”字右 损愈甚；
29							南宋本 “慧”字上 损；
30							南宋本 “凝”字稍 损；
31					“久植勝緣， 何以顯揚”， “何以”二 字泐痕未連 上“緣”字 “糸”旁；	北宋本“緣”字 左下不連石泐 痕；南宋本廿一 行“緣”字左下 已連石泐痕；	南宋本石破 处到“緣” 字右；
32					“深以爲 愧”，“深” 字左上有複 啄筆；		

33			北宋拓“波羅蜜多心經”之“蜜”字完好無損；	
34				南宋本“一”字損去收筆；
35				南宋本“无无明”上“无”字略損，不見筆意；
36			北宋拓“般若波羅蜜多”之“多”字上“夕”部完好；	南宋本“蜜多”，“多”字上兩撇損；
37				南宋本“揭諦揭諦”第二“諦”字中橫損；
38				南宋本“菩提”“菩”字長畫損；

39			南宋本 “太”字上 中损；
40			南宋本 “二”字下 画损；

较其他三本更肥重，且有涂描，字例15“轻”、16“将”、17“生”、19“拙”、20“帝”、23“有”、24“慧”、26“昆”、27“翠”、29“慧”、34“一”、39“太”上野本同样存在这些问题。

字例28，“智地玄奥，感恳诚而遂显”之“奥”、“感”二字。吴氏批注云：“南宋本‘奥’字下、‘感’字右损愈甚。”黑川本、国博本、上图本“奥”字右下稍损，末笔小撇画起笔清晰可见，“感”字有损，戈钩钩笔，心字底清晰可见，而上野本“奥”字末笔撇画已不见起笔，“感”字漫漶私有涂改；

字例37，“揭谛揭谛”第二“谛”字，吴氏认为南宋本“谛”字中横损，黑川本、国博本、上图本“谛”字无损，上野本“谛”字右部漫漶；

字例40，“咸亨三年十二月”之“二字”，吴氏以“二”字下画有损作为南宋本界定的依据。黑川本、国博本、上图本“二”字下画均完好无损，上野本“二”字下画有泐痕。

字例38，黑川本第十八开右侧一行“菩提”之“菩”，吴氏注记云：“南宋本‘菩提’，‘菩’字长画损。”黑川本、国博本、上图本“菩”字完好无损，笔意清晰可见，而上野本之“菩”字明显是其他拓本中“观自在菩萨”之“菩”字剪裁粘补的。同样的现象在上野本中屡屡可见，如字例1，“晋右将军王羲之书”一行，内藤以“右”字“口”内未泐为考据点，而拓本中“晋”字“亚”部笔画连带，及“右”字撇画起笔，与其他三个拓本区分明显。“晋右军”（图3）三字似是其他拓本中剪裁粘补的，且将周围小石花补墨填涂。

再比如，拓本末尾“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一行，上野本与其他三本相去甚远（图4），“文”字首笔笔画连带，“林”字左“木”与右“木”的衔接，笔意完全不同，其他三本“文字”末笔，“林”字左上有明显泐痕，而上野本“文林”二字均无泐痕。“诸葛”二字笔意也大不相同，尤其“葛”字“艹”头，两点与横画的连带，笔势差异明显。上野本此列的笔画也较其他三本更显肥重，同样是其他拓本剪裁粘补的（图5）。

综上所述，如按照吴荣光、王壮弘的考据字和断代标准，罗氏旧藏本很难归入北宋拓本的行列，内藤以翁方纲为依据的题跋诸考据字，来判定此本为北宋拓本，很难有较强的说服力。需要



图3:《大唐三藏圣教序》第一开右页



“晋右将军”局部图



上野本



黑川本



国博本



上图本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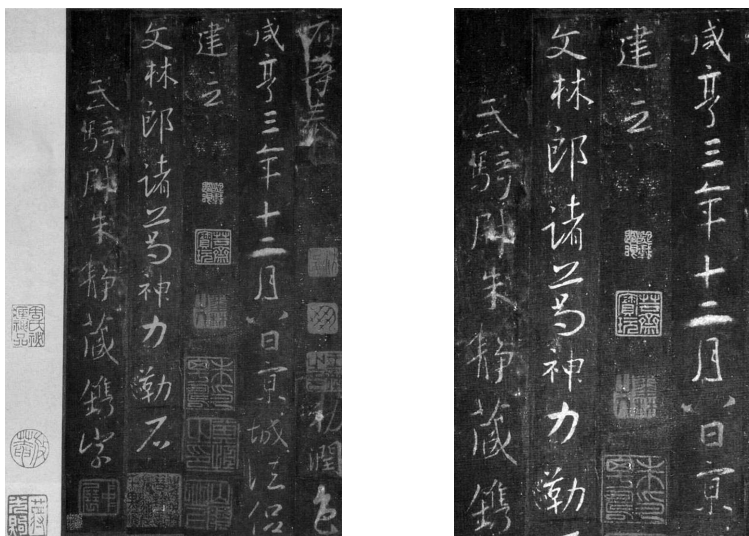


图 5:《大唐三藏圣教序》第二十开左页

“文林”一列局部图

稍加说明的是，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有学者提出“北宋拓早本字瘦硬，北宋晚拓字肥润，南宋拓字渐瘦无力，宋末元明初拓字瘦秃，明末清初拓字秃瘦，中有漫漶”¹⁴⁾的观点，罗氏旧藏本从整体来看，笔画偏于肥润，字的气韵较为完足，骨肉也相对匀称，正契合内藤所言“神理全同”的记述，但是也正如内藤所言“此本屡更改裱，间为工人剪损”、“多剪损移补之字”，很难被称之为“善本”，而是一件基于宋拓，经过旧拓本、翻刻本等其他拓本剪裁修补而成的拓本。

关于罗氏旧藏本究竟是南宋拓本还是北宋拓本，从以上“迷”、“慈”、“鹿”、“缘”、“蜜”、“多”等诸考据字的泐损情况可以提供一些参照。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作为近代初次传入日本的《集王圣教序》宋拓本¹⁵⁾，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连续三版影印发行，这本当时售价“金八圆、金六圆”¹⁶⁾的法书影印本，更是在1912年第四版加印出版（图6），可见其发售传播程度。“1910年，革命前夕，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富冈谦藏一起赴中调查敦煌文献，访问了收藏家端方，看到了传郭熙《溪山清远图卷》等大量以前在日本看不到的名品书画，大为震撼，内藤将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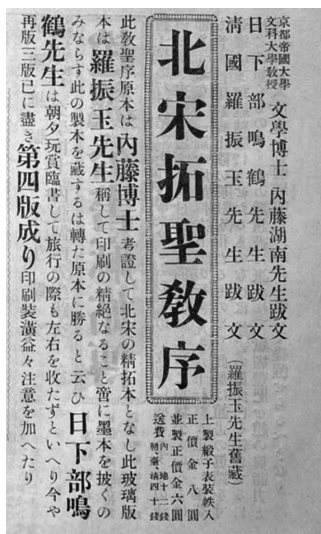
14) 张彦生（1984: 114、1963: 34-38）。“碑贴凡初刻初拓本，字瘦硬，有骨有肉，神气完足。捶拓日久，字口稍渐平坡，拓本有的反觉比初拓本字形灵活肥润，再拓日久由肥而。初唐到碑铭工最精，由原字神，而肥，而到瘦，至细画，肩架肋骨神气仍存，不但集序如此，即九成宫碑、玄秘塔碑等许多碑石亦多如是。鉴定碑帖拓本不慎，常将最旧拓或初拓本，反而看成翻到。”

15) 中田勇次郎（1957: 40）。

16) 《书苑》（1911）。“上製緞子表紙帙入正價金八圓（送費十六錢），並製正價金六圓（送費十二錢）”当时大米价格每10kg 1圆78钱，大学教授收入大致每月30圆左右，新闻记者月收入12至25圆，警察、小学教师月收入8圆。



图6:《书苑·第一卷·第一号》刊末广告单一览
1911年11月



《书苑·第二卷·第二号》刊末广告单一览
1912年10月

访书画的情况告诉了上野理一，这也成为上野理一关心中国书画的契机。上野藏品最早的藏品便是这本，以内藤为中介从罗振玉处购得的《集王圣教序》，而这一拓本也是近代关西中国书画收藏最早的作品。”¹⁷⁾或许是初次接触到《集王圣教序》的宋拓本，也或许是自己中间人的身份，因而内藤对罗氏此本尤为心辄，啧啧称赞，并积极的搭桥引线介绍给上野理一，留下洋洋洒洒五页题跋。虽然是屡经修补、改裱的拓本，在今天也显然难以称得上是“北宋佳拓”的一流拓本，但在近代中日书法交流、书法鉴藏、书法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4 小结

从内藤湖五页长跋中，可以揣度其当时初次看到王羲之这一拓本的震撼和激动，仅仅过去两年，随着各色各样中国古代法书碑帖流入日本，后来出版的黑川本虽然质量明显高于罗氏旧藏本，却似乎也不再新鲜，可以说，内藤湖南、罗振玉等为首，早期对书画事业的投入，开启了近代关西中国书画鉴藏的热潮。伴随中国法书碑帖大量流入日本，以及法书碑帖影印的兴盛，各种《集王圣教序》旧拓本¹⁸⁾也先后流入日本，如三井高坚¹⁹⁾、中村不折²⁰⁾等收藏家入藏的《集王圣教

17) 曾布川寛 (2011: 4-8)。

18) 中田勇次郎 (1957: 40-41)。

19) 白適銘 (2017: 228)。三井听冰阁约在 1911 至 1931 年间前后入藏名为《集王圣教序》版本 13 种。

20) 《书苑》(1913)。连载刊印了中村不折所藏《北宋拓不完本圣教序并完本圣教序二种》。

序》，其中也不乏北宋善本佳拓，以各种渠道得以影印出版，公诸于世。代表性的有，三井听冰阁所藏集字圣教序松烟本（1929年入藏）和刘铁云本（1932年入藏），松烟本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名为《宋拓第一圣教序》²¹⁾，此本之后同样有罗氏于1923年所作的题跋观记：“平生所见怀仁集序此为最上。癸亥四月上虞罗振玉记（钤印：罗振玉印）”，²²⁾王壮弘判定此本为“北宋拓本。”²³⁾刘铁云本民国时有正书局石印本《北宋拓圣教序》刊行，1991年，二玄社影印发行《原色法帖选39集资圣教序》²⁴⁾王壮弘同样判定此本为“北宋拓本。”²⁵⁾

十数年间，这些与“墨皇本”²⁶⁾不相上下的北宋拓本先后流入日本，不断提高和刷新着罗振玉以及日本书画鉴藏圈的眼光和认知。加上当时现代影印技术的普及和法书名迹出版物的刊行传播，上野本《圣教序》在诸多北宋善本中渐趋黯然，后面世的黑川本以及诸多北宋善本也再难获得上野本“一年间连印三版”的推崇程度。曾经作为日下部鸣鹤“朝夕玩赏临写”的经典法帖，如今很难被学书者视为学习取法王羲之《圣教序》的第一范本，学界对《集王圣教序》宋拓善本的整理研究，也很少将上野本纳入考察范围，由此亦可窥见现代印刷术普及和法书出版潮流中，书法“经典”的更迭。

21) “松烟本”内页首开有“原觉”、“王镛之印”鉴藏印，据考证为明代王镛旧藏本，影印本“宋拓第一圣教序”为黄葆戉（1880-1968）隶书题签，款署“青山农”，钤印“葆戉之印”。因拓本据松烟墨拓制，故此本又称为“松烟本”，此松烟本前有方士庶题记，后有韩逢禧、王澐、刘墉、成亲王永理、康有为、罗振玉、汪大燮、梁启超、王国维等名家为其题跋。韩氏在跋文中道：“用松烟且拓手非良工，所以笔画有模糊处，尤喜纸色润白如雪，羨快人意”，“松烟本”一说似由此而来。

22) 《宋拓第一圣教序》（1932）。

23) 王壮弘（2008: 83）。“王澐跋北宋拓本，此册拓甚精，笔画瘦细挺劲。考据与墨皇本同，有王澐、韩逢禧、王国维等人题记。商务印书馆珂罗版印《宋拓第一圣教序》。”

24) 影印本外题签为“北宋拓集右军书圣教序”款署：“光绪三十四年岁在戊申伏日黄自元署检。”钤印：“自元（白文）”。内侧有李瑞清、董其昌题签，内页首开有王铎题记，后有董其昌、李瑞清、王瓘等题跋。《清稗类钞》中有记：“刘铁云藏宋拓唐圣教序：北宋拓《圣教序》，为海内第一本，后有董文敏、王文安两跋。王文敏得此后，经潘文勤、盛伯羲、吴清卿、王孝禹精鉴，咸推为海内第一。后归刘铁云，铁云乃题其后，云‘凡得北宋拓，皆自诩为第一，如梁茵林、崇雨铃是也。然为海内公认为第一本者，为商城周文清公所藏一本耳，梁、崇诸本不如远甚。’云云。且有董文敏、铁冶亭、郭尚先、何子贞等题志。”

25) 王壮弘（2008: 83）：“刘铁云藏北宋拓本：有董其昌、刘铁云跋，考据与墨皇本同，字画瘦细。有正书局石印题为《北宋拓圣教序》。”

26) 墨皇本《集王圣教序》，崇恩旧藏，因帖首“墨皇”二字得名，现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此拓有诸多崇恩题跋，另有何绍基题诗，以及项子京、怡亲王冰玉道人等人的鉴藏印记。崇恩称此拓为“吾家宋拓墨宝第一”，得“右军真面目”。在《圣教序》的诸多传本中，《墨皇本》流传有序，保存完好，是学界公认的北宋善本佳拓。

参考文献

〈论文、资料・中国〉

白適銘（2017: 228）〈19-20世紀碑帖收藏文化之研究——以三井高堅“聽冰閣”舊藏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博士論文。

冯小夏（2013）〈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及其早期拓本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

王澐（2000: 792）《虚舟题跋》，《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书画出版社。

王壮弘（1981）《增补校碑随笔》，上海：上海书店出版。

王壮弘（2008: 78-93）〈集王圣教序版本略述〉，《艺林杂谈》，上海书店出版社。

王壮弘（2008: 81）〈怀仁集王圣教序版本略述〉，《艺林杂谈》，上海书店出版社。

张彦生（1963: 34-38）〈怀仁集王圣教序拓本概述〉，《文物》第3期。

张彦生（1984: 114）《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

《宋拓第一圣教序》（1932），商务印书馆。

〈论文、资料・日本〉

曾布川寛（2011: 4-8）「関西中国書画コレクションへの誘い」、『中国書画探訪：関西の收藏家とその名品』関西中国書画コレクション研究会編，二玄社出版。

中田勇次郎（1957: 40）「宋拓集王圣教序について」，大谷学報。

中田勇次郎（1957: 40-41）「宋拓集王圣教序について」，大谷学報。

油谷博文堂（1911）『北宋拓集王圣教序跋』（上野本）。

油谷博文堂（1913）『北宋拓集王圣教序跋』（黑川本）。

《書苑》（1911）第一卷，第一号。

《書苑》（1913）第二卷，第五号、第六号、第八号。